

要对指令性计划进行改革

蒋一苇在 1992 年 5 月 2 日《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国营企业承担指令性计划的问题。现在的措施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把企业推向市场。我认为真正的改革不在于缩小或扩大指令性计划,而在于对指令性计划本身进行改革。

指令性计划的特点是以行政命令向企业下达任务,它是一种行政行为,因此它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必然不协调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似乎没有指令性计划就失去宏观调控手段。我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把宏观调控的行政行为改变为商业行为。具体来说,国家对物资直接调控,

摒弃“吃饭财政”论,强化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

《财政研究》今年第 4 期发表柳华龙的文章说,“吃饭财政”论是近几年财政陷入困境的思想根源,要振兴财政,必须彻底摒弃“吃饭财政”论。从理论而言,“吃饭财政”与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职能格格不入。从实践而言,“吃饭财政”也不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如果不强化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就很难调整基础产业落后的经济结构。因为基础产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盈利较低,企业

改由物资部门、商业部门、外贸部门,根据国家计划向生产企业直接订货(不是现在的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订货),这些部门向哪些企业订货,可以选择,由这些部门和企业签订合同,这些企业有优先完成这种国家订货的义务,但订货合同的条件则由上述部门与企业协商决定。上述三个部门应当拥有一笔基金,进行物资商品的储备,像五十年代那样发挥物资蓄水池作用,根据市场情况,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商品进行吞吐调节。这样,国家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用物资储备手段,对市场供求以及物价进行调节。从这种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看,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还是完全合理的,它是把计划与市场具体结合的体现;而且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拥有雄厚的国有资金,才可能对市场进行这样调控,这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

(尚摘)

和银行一般不愿意投资,只得主要依靠财政进行投资。从国家财政的发展历史来看,垄断资本主义财政已挣脱少发公债的羁绊,大量对社会经济进行投资调节。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具有组织社会再生产职能的社会主义财政倒要退出生产领域,岂不令人费解!其实,社会主义财政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财政更大量地、经常地参与和调节物质生产,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否认的话,岂不有违社会主义财政的初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这就更需要由国家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越是穷国,越要集中,这是世界经济史的历史经验,我们绝不能漠视!

(明摘)

不要将资金和资本的概念相混淆

《真理与追求》1992 年第 4 期发表苏沛的文章说,近年来,在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性讨论中,有的文章将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或资金称为“资本”。其实资金和资本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相混淆。资金不是资本,正像人民币不是台湾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一样,不能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当作资本来对待,也正像不能在大陆流通使用台湾发行的货币一样。生产资料或货币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变成资本,但是生产资料和货币不等于就是资本。资本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论述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时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论》第 1 卷,第 193 页)换句话说,资本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一道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离的事物,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前和资本主义制度消失以后都没有资本。我国现在社会中有资本,那是同私营经济相联系的,而私营经济是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形态。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不是由资本家占有,这些企业的工人也不是从市场上雇来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全民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的基础上出现的,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王摘)